



王景新



崔海兴

近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求学圆梦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计划到2020年,资助150万名农民工接受学历继续教育。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共4.04亿人,其中农民工总量为2.77亿人,比上年增长1.3%。而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约两成,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还不到一成。这说明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学历层次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

那么,农民工教育的重点在哪里?应采取何种形式?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民工教育问题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技能、学历、素质何者为重

《方案》的教育内容强调对于农民工的再教育一是加强技术技能培训,让他们在短期内获得就业以及增加收入的优势条件;二是加强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培训,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甚至投身创新创业,让他们实现“由内而外”全面的城市化。

在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王景新看来,培训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农民工的技能和管理知识。“农民工要融入城市,接受现代文明,综合素质需要提升。但农民工要在一个地方生存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有一份像样的收入,这样才能有体面的生活。只有农民工有技能在城市当中生存下来,他才有可能融入城市的生活。”

王景新强调,技能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其内涵是与时俱进的。“传统的技能在一些领域仍然需要得到传承和学习,但我所说的技能不全指传统的技能。”王景新认为,技能是根据社会上最新的用工需求不断变化的,是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必需的知识。要跟社会发展潮流、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后工业时代和新型城镇化的需求相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 见

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你可能认为学术界是唯一一个能享受知识自由和挑战性问题的地方。其实,商业世界里也充满了复杂性、智力上令人激动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不管是对解决问题还是对社会都可以产生巨大的价值。有些人开始认识到这个现实。研究生和博士后组织自己的专业发展计划,有时聘请商学院教授来帮助他们。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科技相关的公司,要么是由博士研究生发起,要么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创办。随着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了解了这些机会,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有趣的、有更大追求的商业职业将由博士学位获得者来把控。

赵斌《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商海中的潜在价值》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02444-968026.html>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在推动开放获取(Open Access)上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体现在公开发表上,即向研究者提供图书馆可能不会订阅的出版物;另一方面体现在数据资料上,使得从实验中得出的原始数据公布于众。目前,开放获取期刊也纷纷开始要求发表实验的原始数据,这无疑增强了开放获取的影响力。这种前所未有的科学大共享,不仅仅是数据上的分享,更有观点与思想的交流。在此之前,只有数据的拥有者才有能力来对数据进行解释。但在今天,开放获取使得所有不同背景下的研究者都可以从同一数据中发现不同的假说。

汪洋《开放获取正在重塑学术界》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903646-968084.html>

在科学研究中,需要熟练掌握他人经典方法的能力,这是一个规范化训练的过程,是一种内化的过程,只有在经典形式化思维训练成功后才能谈创新,此时的创新才可能是规范化的、经得起推敲的、科学的、严谨的。若没有经过严格的规范化训练为基础,所进行的创新可能是松散的、不严谨的。没有经过专业化思维的训练,可能更容易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但不可能是合乎逻辑的。

马飞《为什么要进行科学素养的训诫》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8909-968002.html>

要求生存,谋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我们要利用自己在技术开发上的优势,在某个或某几个细分领域,做到最好,做到最强,形成自己的品牌与口碑。二是大家要抱团合作,分工合作。切忌面面俱到,什么都想做;而是能合作就合作,寻找在这个领域做得最强、最好的单位合作,同时保护合作者的知识产权,也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与诚信,与合作单位形成长久的合作共赢关系。若能做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存与发展。

汪晓军《创业的路必将充满艰辛》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2399-968139.html> (栏目主持:沙森)

从“输血”到“造血”:

农民工再教育的道路选择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崔海兴则认为,从短期来看,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再教育是必要的。但从长期来看,学历教育很重要。“现在有一个提法是新型职业农民,很多农民可能掌握一定的技能,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他的技能可能很快就过时了,还需要再培训。”

多种培训方式互补

在农民工再教育方面,有专家提出“互联网+农民工”的方式,以期能降低学习门槛、增强灵活性。

王景新认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有些培训必须采取面对面的现场形式。“有些培训不是网络和黑板上可以教出来的,必须在实际操作中学习,要在实践场地中训练出来,不可能完全依靠‘互联网+’就能做到。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的不同,有的教育需要现代课堂的教育方式,有的教育需要‘师傅带徒弟’的教育方式,有的需要在工厂和实践基地训练,还有一些可以用互联网的形式进行。”王景新强调,这几种方式应该是并存的。

崔海兴对此持相同观点。“培训形式应该多

种结合,对具备上网条件的农民工可以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相应培训。在信息化社会,互联网是信息和知识传播的一个很好途径,通过互联网学习也会是全社会的发展趋势。另一些不具备互联网知识或条件的农民工还是需要面对面面对面的培训来提高技能的。”

政府+企业+公益组织

有媒体评论认为,在农民工再教育方面,政府财政力量毕竟有限,应当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农民工再教育中来。

从王景新以往的调研经验来看,农民工再教育可以从新型农民培训中获得一些经验。“国家在培训新型农民方面划拨了很多经费,组织农民进行培训,但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是:有钱但没有人愿意参加进来。”王景新估计农民工再教育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3亿农民工只有150万的培训目标,这个数量确实不够,经费也有限。但同时也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再教育培训不跟他们的就业实践联系起来,这种培训恐怕很难有听众。”

从社会生产的实践来看,企业都是以营利

为目的,企业在招农民工的时候都要求熟练工。“企业从盈利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很难有动力送农民工去培训。只有国家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企业培训有潜能的技术人才,这样对企业和工人来说才是负担较轻的方式。”

崔海兴认为,政府在农民工再教育问题上应该起到政策引领作用,由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具体实施。“一般采取三种方式,一是政府直接出资进行农民工再教育培训;二是政府出台激励制度和政策,例如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费用可抵扣返还,从而鼓励社会和公益机构进入相关领域,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农民工再教育的热情;三是政府购买服务,对于专门进行农民工培训的第三方机构,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专门对农民工提供培训。”

崔海兴提出,可以大力发挥第三方组织在农民工再教育中的作用。“比如农民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基本的农民服务组织,可以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和服务。”

崔海兴强调,多数农民工的技能还停留在基本操作层面,农民工自我学习的能力还很欠缺。因此,培训需要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要在学习型社会中将农民转变为“学习型农民”。

不创新,毋宁死

■梁波

不再以争取资源为指挥棒。长期以来,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资源争取为导向进行科技创新。毋庸讳言,多年来科研经费的短缺、考核评价的风向以及研究所的生存需要,使得科研人员不得不为争项目、争经费四处奔波,从科学家变成了社会活动家!科技创新成了第二位的工作和“副产品”,许多优秀科研人员脱离了科研一线,把主要精力用于“跑项目”上,偏离了创新本位。然而,研究所的规模、体量决定了资源争取并不是无限的,经费未必是“多多益善”而且,随着国家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长,经费短缺的问题已逐步得到缓解。

人力资源要向创新目标聚集。规模再大的研究机构,其科研目标和资源也是有限的,适度的。要将有限的人力资源向本单位的主要研究方向凝聚,不能哪里“有钱”就向哪里去。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不做“大路货”,不为“过日子”拿项目,要有“科研定力”,聚焦方可突破,分散注定碎片!研究所毕竟不是企业,要把各种资源用在创新这个“刀刃”上。要实实在在地去做有原创性的工作,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一味模仿、照搬照抄。做缺少创新的项目,不但浪费有限的资源,遭学术同行的白眼儿,即使做出产品也会很快被市

场淘汰。无创新,早晚死!

工程和应用项目要做到底。以工程应用为主的研究所以产业化为目标的科技创新,应当“一竿子插到底”,锲而不舍地打通创新价值链的“最后一公里”,持之以恒地坚持、耐心细致地改进。许多技术成果不能够实现转化,主要还是技术成熟度不够;许多产品不能够占领市场,是因为没有创新“绝活儿”。但这并不意味着科研项目都要在研究所内或由研究所去实现转化;可实现产业化的,坚决拿到企业里去,做研究所、课题组不搞小富即安。随着国家对科研机构知识产权使用、处置权和收益权的自主性的扩大,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研究所也可适当作出些“牺牲”,与其让技术成果“过期变质”,还不如大方交给社会,本来科研机构就是靠纳税人的钱做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天经地义。

因此,研究机构和广大科技人员,要坚决树立不创新,毋宁死的观念,否则无创新,则早晚死!“创新”不是时髦的字眼儿,真正将创新落到实处,行动才是硬道理。说到底一句话,要从“跟着走”到“领着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华冰聊专利

专利权是企业股东利益的保障

甲是A公司的投资人,A公司的生意一直很好。乙是A公司的技术总监,负责A公司的产品研发和知识产权相关事务,同时是A公司诸多技术的发明人。后来,乙从A公司离职,并在离职前将A公司的相关专利全部未缴费而失效。乙离职去了B公司,并在B公司申请了新专利,并用新专利告A公司产品侵权,并在各类投标活动中屡屡发出侵权公告,致使各商家不敢贸然采购A公司产品,A公司业绩出现严重危机。

这与事情类似的,是曾经的“华为一哥”李一男。2016年3月15日,李一男涉嫌通过内幕消息炒股,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李一男的故事很多人知道,华为并没有因为李一男的出走出现专利危机。

当核心技术人员或研发团队离开,企业面临的风险如何应对?包括投资人在内的股东利益如何保障?

三思堂

儿童游乐设施亟待监管

据报道,近日河北保定一座充气城堡被风掀翻,上面玩耍的5名儿童被甩出,两人因伤势严重转至北京儿童医院救治。充气游乐设施出事并非孤例,去年6月在广西田阳以及前不久在山东临沂都发生过同类事件。

事故频发首先与这一领域缺乏行业标准和监管的现状有关。我国现行的《游乐设施安全规范》主要针对高空、高速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游艺游乐设施,小型儿童游乐充气设施不在此列,处于监管真空状态,只能由经营者自行管理。而一些经营者安全意识淡薄,安装不规范,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其次,我国还没有制定小型充气游乐设施的相关质量标准。正规厂家一般只在约定期限内保证产品质量,对游乐场内的安全措施提出建议,而具体的日常安检和维护还需要游乐场经营者自主安排。至于那些非正规厂家,产品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不能寄希望于经营者自觉,科学的标准、规范的运作、严格的监管才是有力的保障。因此,希望相关监管措施能尽快出台,使少年儿童能够在安全无忧的环境中玩耍。

快递要快,垃圾处理也要快

统计显示,仅2015年,网购就催生出生近200亿个快递包裹,然而,很少有人能关注到快递包裹背后数量惊人的包装垃圾。

据估算,2015年我国快递行业消耗编织袋29.6亿条、塑料袋82.6亿个、包装箱99亿个,若以1个快递包裹使用1米塑料胶袋计,全年使用的胶袋可绕地球400多圈。而这些材料大多不可降解。

很多快递包裹被过度包装,目的是避免“暴力”分拣。快递“里三层外三层”,商家可以因此得到“包装严实”的好评,消费者也能获得某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如果消费者——商家——快递企业构建的商业生态不发生改变,在各自的现实利益面前,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很难有太大力去拒绝“过度包装”。

针对快递垃圾处理,人们有两条共识:一是绿色化,即推行快递绿色包装,设立包装绿色“国标”,规模化使用环境友好型的包装材料;二是回收,即政府和企业合作搭建包装垃圾回收系统,对快递垃圾进行再利用或循环,使其变成资源。

治理快递垃圾,涵养整个利益链的商业生态,与“绿色包装解决方案”同等重要。

不文明行为何时休

眼下正是百花盛开的季节,而与赏花相关的不文明行为也频繁发生。日前,为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赏花现象,北京玉渊潭公园先后对两位攀折樱花的游客各处20元的罚款,这是自2014年北京市恢复公园“行政执法权”以来,首次开出的罚款单。

20元的数额并不多,应该是公园方面斟酌之后的选择。以此为起点,应该有更多的公园加入其中,形成群体效应,让不文明行为处处受限。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选项,可随之而来的,就是诸多不文明现象的不断曝光。如何提高旅游者素质?正面宣传当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对于一些屡教不改者,罚款等惩罚措施恐怕是最有效的手段。

理论上讲,罚款绝不是根治不文明行为的理想选择,更多人性的方式值得提倡,例如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舆论引导等手段,让民众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营造文明的社会大环境,这才是治本之道。同时,我们决不能忽略罚款等辅助的惩戒手段,这是对正面引导的有力补充,也是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栏目主持:吕小羽)

论道

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总书记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产能过剩的相关产业,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逆向思维方法。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需求”,市场的形成很多时候都是由需求形成的,人有了疾病,于是就会有医生,人怕冷,于是就会有羽绒服。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需求与供给往往是孪生兄弟,缺一不可,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不找市长,找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市场有什么需求就生产什么。

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医师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邓杨春

我们过去的思路,一直强调“辨证论治”,强调“靶点医学”,很多医疗从业者的思路都是“医生病人围绕病来转”,有了心脏病就有治疗心脏病的药,有了各种手术,有了各种医疗器械,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从需求到市场,再从市场到产品。但“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恰好给我们一个逆向思维的途径,通过改变“供给”来有效地引导医生、病人及病人家属对待生命的态度,对于中医药来说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理念。结合中医药的特点,我们在“供给侧”有很大的作为空间,譬如现代老百姓看中医门诊次数要远远低于西医门诊,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缺乏中医师,尤其是缺乏好的中医师,一个好的中医师会吸引很多病人的到来,以至于疗效好的中医师相当难找。中医药在未来要想很好地发展,就必须增加中医师的数量,就必须增强中医师的质量。中医师多了,可供百姓选择的就会更多样化了,自然就能拉动需求,增加中医药治疗疾病覆盖面。

着力社区医院建设,开辟广大基层“根据地”

对于医生来说,深入到基层,在医疗器械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用中医望闻问切的手段处理疾病,汤药针灸按摩导引等方法解决问题有利于医生本身医疗技术的逐步提高,很多著名中医家都是从基层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医疗实践水平,终成一代大家。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医药教育探索出新的途径,反映现在学院教育,相互之间取长补短。

社区或者农村,因为医疗资源匮乏,基本上是供给决定需求,譬如常见的感冒有时就是一碗姜汤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是在大城市,一般人就会吊瓶、输液了,但是农村人则会用姜汤解决,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不同的环境下供给不一样,造成生活习惯不一样,最后决定处理事情的方法不一样。

现代社会是市民社会,“社会主义”原本也是建立在小共同体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小共同体的社会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是陌生人的关系,而是一种“温情脉脉”地缘共同体,再加上血缘共同体,非常适合中医的发展。其一方面可以减缓现在医疗资源紧张造成的就医难、看病贵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疏导分流集中诊治造成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再者因建立在“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之中,医患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能够促进和谐社会。

所以增强社区医疗资源供给,特别是中医药资源的供给是一举多得之事,能在医生培养、人民健康、节省医疗资源、促进和谐社会中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

大力挖掘“治未病”市场

中医药一直强调“上医不治已病病未病”,《说文解字》对“未”的解释是“味也”,并说“六月,滋味也。象木重枝葉也”,五六月的时候正当树木茂盛,枝叶重重之时,这时的果实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所以“未病”可以直译为“没有成熟”的病。只要疾病还没发展到要进医院,要打针吃药,都可以是未病阶段,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没有成熟的病”,如果在疾病还未成熟时就扼杀了,那就不需要实施治疗。因此,人民在这个层面上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这也是这几年“养生热”之所以火的原因。中医如何在“治未病”这个需求存在的情况下,把需求变现为“需求量”将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也能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如何在“供给侧”提供更多的切实有效的选择将决定“治未病”走得成功不成功,“治未病”的成败与否将直接决定我们到底是“上工”还是“下工”。

在存在需求,而且需求可以很大的情况下,如何将需求转化成需求量,如何成功地将疾病扼杀在萌芽阶段,“供给”和人民的购买力将成为决定性因素,在全国人民消费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供给就成为“治未病”的一个关键因素了。在前面提出的培养更多的中医师,培养更好的中医师基础上,恐怕还需要对中医原来具有的“汤药、丸、散、膏、丹”等剂型、“针、灸、按摩、导引、房中、吐纳、练功”等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并创新形式,增强各种方法的简便性,把人民对“治未病”的需求转化成实际行动,转化成经济效益,最终达到全民健康的目的。现代“‘创’”“创业”,养生、健康管理等行业的兴起,将无形地推动中医药“供给侧”改革,也将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活力,值得我们鼓励和借鉴。

(作者系中华中医药学会研究实习员)

从「供给侧改革」助力中医药振兴发展